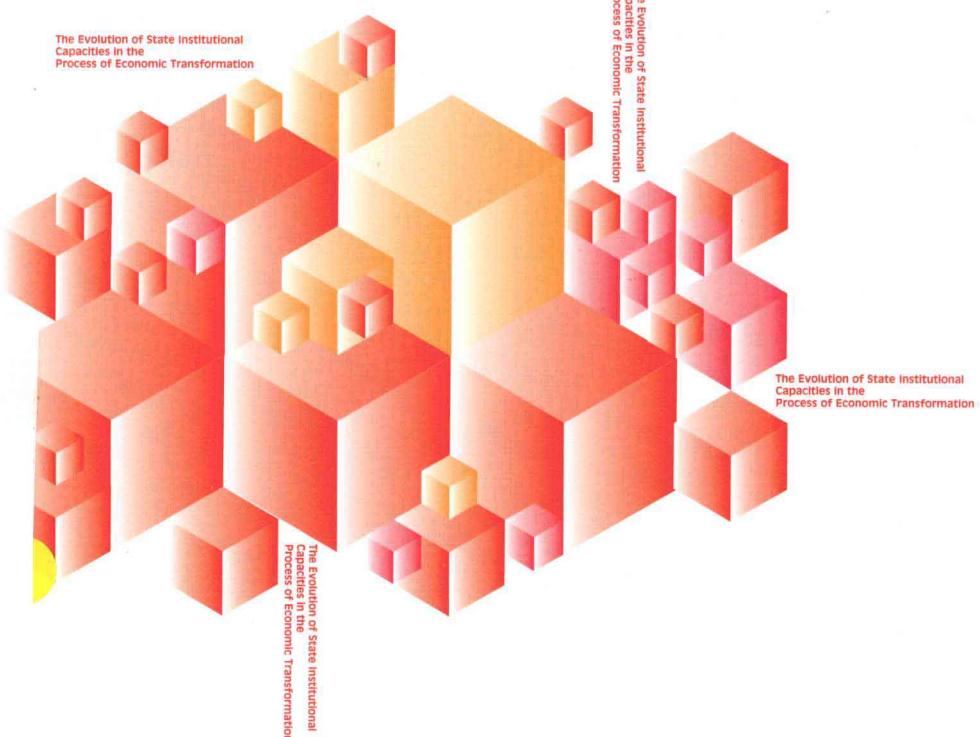


The Evolution of State Institutional Capacitie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Analysis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n Chinese and Russia Transformation

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制度能力演进

——中俄转型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分析

黄秋菊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The Evolution of State Institutional
Capacitie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Analysis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n
Chinese and Russia Transformation

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 制度能力演进

——中俄转型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分析

黄秋菊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制度能力演进/黄秋菊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12
ISBN 978 - 7 - 5096 - 2273 - 5

I . ①经… II . ①黄… III . ①经济转型期—国家制度—对比研究—中国、俄罗斯
IV. ①D62②D751.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9909 号

组稿编辑:王光艳

责任编辑:王光艳 杨雅琳

责任印制:杨国强

责任校对:超凡

出版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www.E-mp.com.cn

电 话:(010)51915602

印 刷: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20mm×1000mm/16

印 张:13.25

字 数:259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96 - 2273 - 5

定 价:4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010)68022974 邮编:100836

序 言

中国和俄罗斯在20世纪末相继走上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道路，开启了人类现代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规模制度变迁过程。受不同的初始条件和改革决策的影响，中俄两国的转型路径和绩效呈现出巨大差异。俄罗斯在转型之初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激进转型战略，但旋即陷入制度崩溃与经济严重衰退的陷阱之中。尽管其后对激进转型战略进行了诸多修正，经济逐步复苏，但依然面临严重的结构失衡与制度扭曲。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没有完全采纳西方世界开出的“转型处方”，而是立足国情，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稳健而卓有成效的市场化道路，确保了国家秩序的稳定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虽然渐进式转型的道路亦不平坦，但三十多年改革积累起的物质财富、体制优势和宝贵经验，为中国进一步深化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中俄两国转型绩效差异的解读，历来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与此相关的解释也异彩纷呈。黄秋菊博士的专著《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制度能力演进——中俄转型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分析》独辟蹊径，从国家制度能力这一研究视角出发，对中俄两国的经济转型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对两国转型路径与绩效的差异做出了逻辑一致和令人信服的解释，并从培育和增进国家制度能力入手，对中俄两国未来的经济转型趋势进行了探讨和把握，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策略选择。全书逻辑清晰、结构合理、论证严谨、资料翔实，体现了作者对中俄两国经济转型问题的扎实研究。该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该书围绕国家制度能力这一核心变量，建立了一个研究经济转型的理论框架，对国家制度能力的概念进行了清晰界定，并详细阐释了国家制度能力的基本构成、影响因素以及国家制度能力的演化路径，从而为转型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富有新意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工具。

第二，基于国家制度能力的理论框架，该书分别从国家的制度形成能力、制度实施能力以及制度调适与学习能力三个维度出发，对中俄两国经济转型的路径、绩效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了一系列对转型国家深化制度改革与建构国家制度能力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结论和启示。

第三，该书构建了一个国家制度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并应用这一指标体系对中俄两国转型期的国家制度能力进行定量评估与比较，从而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制度能力形态具有“勾结型国家”、“掠夺型国家”和“失败的国家”三大特征；而中国的国家制度能力形态则具有“自主



性国家”、“发展型国家”和“强国家”的综合特征。

第四,该书运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经济与政治互动的视角出发,对转型这一大规模制度变迁过程进行深刻解读,探寻驱动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并以国家制度能力为聚焦点,对转型涉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整合,体现了一种“大转型”的研究范式。

黄秋菊博士在我的指导下一直从事中国与俄罗斯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和刻苦的学术钻研,使得她能够很好地完成该书的研究课题。在学期间,她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等重要项目的研究工作,并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本专著的出版也是对她前期研究成果的一个最好注解。当然,中俄两国的经济转型尚未终结,这就需要我们对两国的转型道路进行持续性的追踪研究,希望黄秋菊博士能够在这条研究道路上做出更多富有建设性的学术尝试和贡献!

景维民

2012年11月

前　言

20世纪末发生在中国和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一场涉及多个领域的大规模制度变迁过程。然而,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俄两国的转型路径和绩效却出现了明显的大分化。转型之初,俄罗斯虽然遵循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推崇的标准转型战略——“华盛顿共识”,但却长期陷入经济严重衰退与社会秩序极度分裂的转型危机中;而中国却在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从而创造了经济转型的“中国奇迹”。尽管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对中俄两国的转型绩效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国家制度能力构建策略及其演化路径的差异是决定中俄两国转型绩效差异的关键变量。

本书以国家制度能力为研究视角,对中俄两国的经济转型路径、绩效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进行了详细分析,着重探讨了两国不同的国家制度能力演化路径的内在形成机理以及国家制度能力差异与转型经济绩效差异的内在关联,并对中俄国家制度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估和比较,最终得出了若干对转型国家和发展经济体的国家制度能力构建与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和启示。以国家制度能力为切入点来研究中俄两国的经济转型,体现了一种“大转型”的系统性研究视角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转型的整体性路径演化轨迹,深刻洞察转型进程中存在的核心制度问题,并在转型深化阶段探寻有效的制度改革战略。研究中俄两国转型进程中的国家制度能力演化问题,不仅为转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经验支撑,也为这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创建了一个崭新的知识生长点。本书的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全书的绪论。该章首先从理解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之谜入手,引出国家制度能力这一研究主题;其次对中外学术界关于经济转型、制度变迁以及国家能力的研究进行综述和评析;再次阐述了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最后对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进行了归纳总结。

第二章建立了研究中俄两国经济转型与国家制度能力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该章以制度与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制度能力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分析了国家、制度与经济发展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将国家制度能力界定为国家制定、实施和推动制度变迁的能力。其次,进一步将国家制度能力的构成划分为国家的制度形成能力、国家的制度实施能力和国家的制度调适与学习能力,并清晰界定了国家制度能



力三个构成部分的内涵,对这三种国家制度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利用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博弈模型,从静态角度分析了国家治理形态与国家制度能力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动态角度研究了两条国家制度能力的演化路径,即国家制度能力的积极构建路径和消极退化路径,并归纳总结了国家制度能力积极构建的必要条件。

第三章对国家制度能力与经济转型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该章首先从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转型观入手,提炼和归纳出制度主义的经济转型观,并利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主观博弈模型研究了经济转型的阶段性与路径演化特征。其次对转型进程中出现的经济绩效分化现实进行了描述,并对具有代表性的三种解释转型绩效差异的观点进行了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制度能力是影响转型绩效的关键变量,并构建了一个国家制度能力与社会能力的最优配置模型,以分析国家制度能力与转型经济绩效的内在关系。

第四章由定性分析转入定量分析。该章构建了一个由三个一级指标和八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国家制度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并应用这一指标体系分别对中俄两国的国家制度形成能力、制度实施能力和制度调适与学习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在此基础上对两国综合的国家制度能力进行比较。通过这些比较,归纳出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制度能力形态具有“勾结型国家”、“掠夺型国家”和“失败的国家”三大特征;而中国的国家制度能力形态则具有“自主性国家”、“发展型国家”和“强国家”的综合特征。

第五章着重深入研究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制度能力衰败与转型危机的内在形成机理。该章首先研究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强国家”的崛起,分析了苏联时期的经济改革与国家制度能力削弱的过程。其次着重研究了“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国家制度解构与能力衰败的内在机理,即激进转型战略的形成导致国家制度形成能力的僵化;制度结构的解体导致国家制度实施能力的耗竭;利益集团的制约导致国家制度调适能力近乎丧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国家制度能力衰败与俄罗斯转型危机的关系。最后,进一步研究了俄罗斯普京执政时期和“梅普共治”时期俄罗斯国家治理方略的转换,以及所采取的重塑国家制度能力的战略举措,并对俄罗斯未来的转型路径与国家制度能力改进的方向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第六章则转入对中国转型期国家制度能力培育与转型奇迹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该章首先研究了全能主义国家支撑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并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曲折探索对国家制度能力的影响。其次着重研究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制度能力构建与培育的内在机理,即国家治理目标的灵活转换促进了有效制度改革能力的形成;国家权能范围的适度调整维系了国家必要的制度实施能力;国家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做出适应性调整,增强了国家的制度学习能力。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家制度能力培育与中国转型奇迹的内在关系。最后立足于经济转型深化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崭新挑战,集中论述了改进和提升国家制



度能力的战略举措，并分析了国家制度能力提升与中国的转型发展方向。

第七章对全书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得出若干结论和启示。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制度能力是理解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崭新理论视角；二是国家制度能力是导致中俄两国转型绩效差异的关键变量；三是国家制度能力构建是转型深化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转型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本书得出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制度构建与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三方面重要启示：首先，社会经济转型不能以牺牲国家制度能力为代价，为此，应关注转型的策略选择，保持制度变迁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其次，在经济转型中，应处理好国家制度能力构建的三大核心问题，即国家自身的建设、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最后，在转型深化阶段，应关注国家制度能力构建中的内外联动效应，确保国家发展的自主性和有效性。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国家制度能力:理解中国和俄罗斯转型之谜的关键维度	1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及评析	4
一、关于经济转型的研究概述	4
二、关于制度、制度变迁的研究概述	7
三、关于国家、国家能力的研究概述	11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7
一、研究内容	17
二、研究方法	20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研究的创新点	23
一、本书的研究思路	23
二、本书的创新之处和研究的重点难点	24
第二章 国家制度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	25
第一节 国家制度能力的分析起点与内涵界定	25
一、制度与经济发展	25
二、国家与制度供给	32
三、国家制度能力的内涵界定	35
第二节 国家制度能力的构成	37
一、国家的制度形成能力	37
二、国家的制度实施能力	44
三、国家的制度调适与学习能力	50
第三节 国家制度能力形成的博弈分析与演化路径	52
一、国家治理形态与制度能力:静态分析	52
二、国家制度能力的基本演化路径:动态分析	54



第三章 国家制度能力与经济转型	58
第一节 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	58
一、理解经济转型的制度主义视角	58
二、制度变迁轨迹与经济转型的路径演化特征	62
第二节 国家制度能力差异与经济转型绩效分化	66
一、经济转型的绩效分化	66
二、国家制度能力：影响经济转型绩效的关键变量	70
第三节 本章小结	77
第四章 中俄国家制度能力的测度与评估	78
第一节 中俄国家制度能力测度的理论依据与基本原则	78
一、国家制度能力测度的理论依据	78
二、国家制度能力测度与评估的基本原则	80
三、国家制度能力评估指标的结构	81
第二节 国家制度能力的测度与评估	82
一、中俄国家制度形成能力的测度与评估	82
二、中俄国家制度实施能力的测度与评估	86
三、中俄国家制度学习能力的测度与评估	90
四、中俄国家制度能力的综合比较	91
第三节 本章小结	92
第五章 国家制度能力衰败与俄罗斯的转型危机	94
第一节 俄罗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制度能力	94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强国家”的崛起	95
二、经济改革与国家制度能力演变	103
第二节 国家制度解构与能力衰败：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转型危机	111
一、激进转型战略的形成与国家制度形成能力的僵化	111
二、制度结构的解体与国家制度实施能力的耗竭	115
三、利益集团的制约与国家制度调整能力的丧失	123
四、国家制度能力衰败下的俄罗斯转型危机	126



第三节 国家治理方略调整与能力重塑:后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转型的路径走向	128
一、后叶利钦时代的国家治理方略调整	129
二、重塑国家制度能力的战略举措	131
三、强化国家制度能力与俄罗斯转型走向	137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42
第六章 国家制度能力培育与中国转型奇迹	145
第一节 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制度能力	145
一、全能主义国家支撑下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	146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曲折探索与国家制度能力的削弱	152
第二节 国家制度构建与能力培育:中国的转型奇迹	155
一、国家治理目标转换与制度改革能力的形成	155
二、国家权能范围调整与国家制度实施能力的维系	158
三、制度转型的适应性演进与国家制度学习能力的培育	168
四、国家制度能力构建与中国的转型奇迹	172
第三节 经济转型深化与国家制度能力提升	176
一、经济转型深化阶段面临的挑战	176
二、提升国家制度能力的战略举措	180
三、国家制度能力提升与中国的转型走向	183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85
第七章 结论与启示	187
第一节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	187
一、国家制度能力是理解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崭新理论视角	187
二、国家制度能力是导致中俄两国转型绩效差异的关键变量	188
三、国家制度能力构建是转型深化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转型国家的 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190
第二节 本书的主要启示	191
参考文献	196
后记	205

第一章 絮 论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生在俄罗斯、东欧以及东亚30多个国家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进程引起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对转型的本质从不同角度加以诠释,如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法制转型、文化转型等,以至于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要用一种综合上述各个层面的大制度范式来重新认识转型的本质和进程。^①本书认为,上述各个层面的转型实际上都可以纳入国家制度能力这一分析框架中来。

第一节 国家制度能力： 理解中国和俄罗斯转型之谜的关键维度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发生在俄罗斯、东欧和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在理论界与政策实践领域引发了诸多令人费解的“转型之谜”。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转型之谜”当属中国的体制改革与转型之谜。概而言之,中国在没有完全遵循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某些国际经济机构所推荐的“最优”转型战略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稳健而卓有成效的市场化改革与转型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保持了宪政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而且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使大多数社会民众在没有承受太大转型成本的条件下逐步跨入市场经济的大门并使得自身的信念系统与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与中国相比,俄罗斯在转型之初就奉行一种理性设计与激进变革的转型理念与改革逻辑。以叶利钦、盖达尔、丘拜斯为代表的自由派改革势力认为,转型的鸿沟不能分两步跨越,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在全面瓦解计划经济体制的废墟上一次性地全面构建起

^①亚诺什·科尔奈.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来。为此,俄罗斯政府全盘接纳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一次性、同步地实施价格自由化、经济私有化以及宏观经济稳定化的“休克疗法”,以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完备而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效果却出乎意料。激进式转型将俄罗斯立即带入一个制度崩溃与经济严重衰退的发展陷阱之中。虽然俄罗斯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逐步实现了经济复苏,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内生机制却并未形成,因而在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增长再度出现重大波折,从而使得刚刚从转型衰退中复苏的俄罗斯经济又一次陷入经济萧条的“寒冬”(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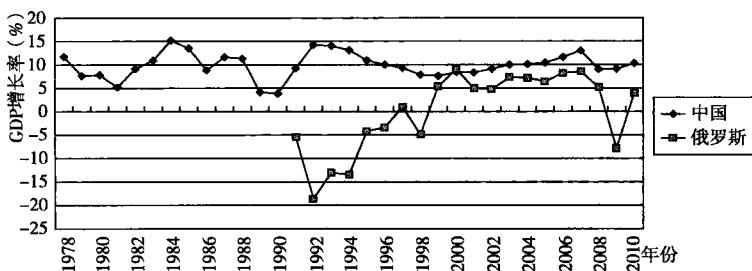


图 1-1 中俄转型期的经济增长绩效比较

对于中国与俄罗斯转型之谜的解读,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成为转型经济研究领域人们持续关注的焦点话题。具有不同学科背景、带有不同意识形态偏好的经济学家们对此给予了不同的解释。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于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如转型前的经济结构差异、计划体制持续的时间和严格程度、宏观经济扭曲状况、地缘政治、历史文化因素等。另一些学者则将其归因于不同的经济转型方式,如激进式转型还是渐进式转型。还有一些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试图揭开中俄转型之谜。例如,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的激进式变革虽然在短期内推动了政治、经济、法律等层面的正式制度变迁,但是却忽视了其历史上长久形成的习俗、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滞后性,结果盲目地移植外来制度造成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一致性,影响了制度运行的效率;而中国则根据自身的文化和国情,创造性地探索出许多合理、适宜的制度安排,推动了经济转型的顺利、平稳进行,保持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实际上,无论是对初始条件的准确把握还是对转型方式的明智选择,都与国家这一推动经济转型的独特“制度装置”的作用密不可分。而目前转型经济学领域也已经逐步兴起了一股“国家回归”的潮流,以分析国家在推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作用。

曾经以提出“历史终结论”而闻名于世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著《国家构建: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软弱无力的“弱国家”是造成社会无序与经济停滞的最终祸根。由此,他



对其原先的理念做出重大修正：“国家的衰亡并不是通往理想国而是灾难的前兆。贫困国家之所以无法发展经济，关键是它们的制度发展水平不适当。它们不需要什么都管的国家，但它们确实需要在有限范围内具有必要功能的、强有力并且有效的国家。”^①俄罗斯研究转型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弗拉迪米尔·波波夫在俄罗斯转型十五年之际（2007）也再次对中俄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转型做出反思。他试图通过更为“先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条分缕析地仔细检验影响转型绩效的各种因素。最终得出了几乎与福山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国家的力量特别是国家的制度能力在决定经济转型与发展绩效领域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他看来，中国良好的转型绩效恰恰是因为在国家的制度能力方面，中国看起来似乎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相反，曾以“强国家”闻名的俄罗斯，在转型进程中却沦落到国家衰败、能力薄弱的地步，自然导致俄罗斯陷入秩序崩溃和经济衰退的边缘。此外，美国学者杰弗里·米勒和斯托亚·坦尼夫对中俄两国转型的比较研究也证实了国家制度能力在转型进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他们认为，中国转型成功的首要原因在于通过持续不断的行政改革来改进政府官员的激励结构，并且在提高企业和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同时，保持了中央政府实施必要控制的能力；而俄罗斯则采取了一种经济改革优先于国家重构的策略，所有的改革都是在维持一个“弱国家”的环境中进行的，结果自由化与私有化改革成为一个纯粹消耗国家能力、剥夺社会财富的“浪费性”制度变迁过程。

学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无疑为我们重新理解中俄转型之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但其中仍有许多富有学术价值的细节值得我们仔细深入探究。一是对于如何理解、界定国家制度能力，学术界依然莫衷一是，尚未达成共识；二是国家制度能力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即国家制度能力的构成仍需要进行清晰地划分、界定与分析；三是有哪些因素对国家制度能力特别是转型国家的制度能力产生最为重要的影响，仍需深入总结；四是如何对国家制度能力的强弱做出准确的定性与定量测度，则是对转型国家衡量、评估其国家制度能力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工作；五是如何运用国家制度能力这一分析性概念以及相应的理论框架，对中俄两国的转型路径与绩效做出全面、系统、深入、准确的比较研究，并从中提炼和归纳出国家制度能力构建的有效策略，这无疑对未来转型国家的制度转型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书试图对以上五个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种学术尝试无论是对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构建，还是对转型经济实践问题的研究无疑都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① 弗朗西斯·福山. 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115.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及评析

论题的核心是经济转型进程中国家制度能力的构建与培育问题。为什么要研究国家制度能力？为什么要构建和培育国家制度能力？中俄转型的路径差异与国家制度能力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带着这些问题，在梳理、分析中外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的理论观点与前人研究成果相衔接。本书沿着制度—国家—国家能力这一线索，通过对相关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的梳理引出国家制度能力的概念。

一、关于经济转型的研究概述

在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总会有一些重大的变革进程激起阵阵波澜。它们不仅剧烈地改变着既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结构，而且也在深刻地重塑着社会成员的心理、认知和行为模式，从而标志着社会的整体跃迁。发端于 20 世纪末的大转型(Transformation)则是其中颇为壮观的一幕。本书所使用的经济转型、转型经济、经济转轨、转轨经济均是指这一历史进程。本书的研究是以中俄的经济转型为研究背景的，因此有必要对经济转型的有关研究进行回顾与梳理。转型经济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主题是什么？对转型经济的研究采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它涵盖哪些研究内容？转型经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成为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

1. 转型经济的研究对象及其内容

转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事件，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随着研究的深化和扩展，研究视角越来越多样化，研究对象不仅内涵明确，而且外延也趋于扩展。事实上转型的研究对象早已超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转型的范围，研究重点放到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构建上，以保证国家的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涵越来越丰富。对此，靳涛、周冰指出，转型的研究对象应当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体制转型或者说经济转型，指从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即狭义的转型；第二个层次是国家或社会的转型，是指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再加上政治体制转型；第三个层次是文明的转型，这是历史意义上的转型，它是指国家转型再加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可以称为广义的转型。转型的过程就是从狭义转型走向广义转型的过程。从广义转型的角度来看，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凡是社会的经济体制、国家和政治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和转折时，都会在各个历史尺度的前后相继的两个历史阶段之间形成过渡时期，这一时期都是一种不稳定的、非常规的体制、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从一般意义上讲，历史的转折和衔接的过渡



过程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是周期性出现的,但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在正式的历史分期表或者社会形态和体制分类表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是研究的空缺,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研究课题。

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不仅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也是社会经济自身组织结构和存在方式的变化,变迁和变化的目的在于重构社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将转型经济研究对象或者说研究主题仅仅确定在研究体制转变上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把体制转变、社会重构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注重研究体制转变对转型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转型是指中国目前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是指中国正在从不发达状态迈向现代化。正是由于转型与发展这两项任务结合在一起,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尤其错综复杂,这里既有转型中的问题,又有发展中的问题^①。

但凡研究转型经济的学者都会发现,在所有转型经济文献中存在着三个重要概念,即过渡、转轨和转型。厘清这几个概念,既是理解转型经济的前提,又是转型经济学形成的基础。过渡、转轨和转型三个概念的核心内涵虽然是一致的,都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但它们各自所突显的重点并不相同(周冰,2007)。“过渡”一方面表明逻辑的起点在计划经济、终点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两头明确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强调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变化过程。转轨也同样暗含了两端明确的意思,但转轨的内容更狭窄,即经济调节机制从“计划轨”向“市场轨”转化。而转型强调的是这个变动过程的性质,属于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改变,是从一种体制模式到另一种体制模式的转换,起点虽然还是计划体制,但终点则出现了动态和不确定的特征。目前这三个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还被混用着,核心的内涵没有很大的争论。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转型是最能准确表达这一研究领域和对象的特有术语。

2. 转型经济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

转型经济涉及领域比较宽,这就决定了转型经济研究的方法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由众多方法优势互补组成的方法群。正如罗兰所说:“好的转型经济学研究,应当总是得出对经济学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这一观点之所以是正确的,主要是因为好的模型可以适用于许多不同的情况,还因为经济学家使用共同的工具去分析不同的情况,这些工具来自共同的语言。没有理由相信转型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的种种相互作用,是与其他的经济的相互作用完全分离的。”在这个方法群中按照目前转型经济研究业已形成的各种研究范式来看,主要归为以下几类:激进与渐进的分析方法;转型的收益—成本分析方法;宪政与非宪政的分析方法;制度分析

^①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M].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1-2.



方法^①。

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目前存在着三种主要的理论研究范式,它们分别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比较经济学范式和新制度经济学范式。

第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

第二,比较经济学理论范式。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比较的对象。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性。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范式。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奈、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3. 转型经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经济转型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也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转型经济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与演化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有产物,而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伴生物。转型经济学研究必须在吸收既有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现有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约束,进行创新性扩展与重构,才能形成有生命力的学科。

学者们对于转型经济学抱有极大的热情与期待。有的学者从我国特殊的转型

^① 吴垠,刘灿.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发展方向[J].经济评论,2009(4):132-139.